

# 六朝文化研究续议

李良芳 胡阿祥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江苏南京 210093)

内容提要:熟悉基本文献资料,利用文物考古资料,把握相关理论与学说,并且妥善处理“致知”与“致用”的关系,是拓宽加深六朝文化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几个方面。

关键词:基本文献资料 文物考古资料 理论 学说 经世致用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六朝文化研究刍议》(《东南文化》2009年第1期,以下简称《刍议》)讨论了六朝文化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前提,即“立足于宏观的层面,厘清相关概念,明确时代特征与文化面貌,更新认识,追求创新”;文章最后又指出:“拓宽加深六朝文化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熟悉基本文献资料,利用文物考古资料,把握相关理论与学说,并且妥善处理‘致知’与‘致用’的关系,也是值得重视的几个方面。”以下就此稍作展开。

## 一 读常见书与用新资料

历史研究当然离不开文献资料,而文献资料的数量多寡、难易程度,又会影响到研究的路径和研究者的素质。以先秦史与明清史为例:有关先秦史的传世文献既少,行文又或简练或古典;有关明清史的文献则数量巨大、类别众多。如此,从事先秦研究,既要求研究者具备古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考古学等方面的素质,又要求具备竭泽而渔的史料搜集功夫,并养成不盲从后世注疏家解释的习惯;而从事明清研究,则要练出从恒河之沙一般的文献中披沙拣金乃至点石成金的本领,还要有足够的体力,能到藏书机构、到田野采集关键或独特的文献。至于辽、金、西夏、蒙元史,“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相互补证”<sup>[1]</sup>,即是基本的学术路径之一,则研究者如果不能具备民族语言、域外语言的良好修养,就势难取得真正的成就。

相对于先秦明清,研究六朝史的明显优势之一是文献资料数量适中而且比较容易掌握。打个

形象的比喻:先秦文献是哪怕“芝麻”也得当作“西瓜”;明清文献是“西瓜”也就仿佛“芝麻”;而六朝文献,“芝麻”就是“芝麻”,“西瓜”就是“西瓜”。当然,这些有关六朝研究的文献资料,也存在着如何掌握的问题。循序说来,其一,要会找书,要懂目录学。一些入门指导书值得初学者翻阅,如文学方面,有穆克宏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中华书局1997年)、刘跃进的《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但在文化方面,毕竟缺乏如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那样具有指导研究意义的好书。其二,需要明了史料的特点。六朝史料特点有以下几项:正史占重要地位,私史众多,史注之风盛行,传记与谱学兴盛,地志发达,佛教道教史料涌现,总集出现<sup>[2]</sup>。其三,更加重要的是,对于史料存在的问题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抱着怀疑的态度进行考辨,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前人。以《宋书》为例,学者们公认“八志”是《宋书》的精华所在,“是两个半世纪(220~479年)天文、地理、政治、社会以及典章制度的总括,为研究了解这一历史阶段,提供了大量宝贵而重要的文献”<sup>[3]</sup>。然而《宋书》“八志”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仅言《州郡志》,断限不严,为例不纯,彼此矛盾,记载疏漏或欠缺,考辨讹误,叙次不清,这些《州郡志》本身的问题,再加上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中华本校点中存在的错误,“如果不甚明了这些问题,不但《宋书·州郡志》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而且严重者还会误读误用

收稿日期 2009-10-29

作者简介 李良芳(1975~),女,南京晓庄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史。

胡阿祥(1963~),男,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史料,或者根本就无法理解史料”<sup>[4]</sup>。《宋书》的纪、传及其他志中,也不乏各样的问题。如日本学者安田二郎经考证指出《宋书·傅弘之传》中,“傅弘之曾任本州(雍州)主簿、秀才一事,也不是事实,是后来人为追加的经历,可以理解为一种虚假的官历”;类似这样“虚假的经历”还广泛存在于魏晋南北朝之相关“正史”以及作为编纂“正史”依据的“国史”与文书中!<sup>[5]</sup>再以《三国志》为例,2002年《三国志》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吴金华先生的《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修订刍议》,以及与会诸君的论著与言论,使人颇觉心惊:“中华本《三国志》竟然存在那么多的各样问题!本来……所谓‘史之所难,无出于志’,志中问题往往极多……而无志的《三国志》原文、校点也是问题丛集,此前实未料到”;“越发感叹治史的辛苦,考据、义理、辞章既三者不可或缺,考据作为基础,不仅要读书、用书,而且要知书、疑书,举凡目录、版本、凡例、校勘、训诂、传注、辨伪,等等,都属读书、用书的前提。非如此,则有失严谨,算不得高明”<sup>[6]</sup>。

六朝研究者对于各样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当有系统、全面的认识,当养成知世论人、知人论书的思维。即言关涉六朝的正史,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有与朝代更迭、南北战争、内部战乱关联较多的曲笔回护、略而不详,与争夺正统有关的彼此贬抑,与现实政治、作者家世有关的弥缝忌讳、虚美增饰,与散佚不全有关的移植补作,与整编改写有关的删节失当,等等;而具体到各别正史,也往往存在着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如《三国志》的正统观念与感情倾向,《晋书》、《隋书》的成于众手与连带的彼此抵牾,《南史》为求简明扼要而删略出来的本不存在的官制名称,等等。如此,我们既要明确相关正史的史源状况、成书顺序,进而明确其间的继承、改变与创新关系,在具体使用时,更要多加比照,即不仅记载内容有所重合的前后正史之间比照,立足于南北政权各自立场的正史之间、正史与《资治通鉴》之间,也都有比照的必要。研究者常常会有这样的经历:带着怀疑的眼光去看文献,往往就陷入了文献特别是文献考校本身,于是文章越写越少,而札记越积越多,毕竟文献的考校是功德无量之举,所以陷入文献本身的研究,也是值得的,因为不经过这样的过程,将文献拿来直接就用,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有关六朝的基本文献资料例举如下:首先是正史。直接的八部正史,依次为《三国志》、《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晋书》、《南史》;相关的四部正史则是《魏书》、《北齐书》、《周

书》、《北史》。如此,在所谓“二十四史”中,一半的正史与六朝研究密切相关。同时还要注意范晔《后汉书》的纪传、司马彪《续汉书》的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二十五史补编》、《二十五史三编》、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劄记》等等中的相关成果<sup>[7]</sup>。其次是“资料书”,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唐地理书钞》、《汉唐方志辑佚》,以及三国与南朝等几部《会要》。再次是与正史意义相当的《资治通鉴》、《建康实录》、《通典》。又次是几部常用的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以上都属需要通读或者常翻的基本文献。关涉六朝文化的文献,最要者如《文选》、《玉台新咏》、《诗品》、《文心雕龙》、《抱朴子》、《搜神记》、《人物志》、《高僧传》、《弘明集》、《洛阳伽蓝记》、《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水经注》、《华阳国志》、《六朝事迹编类》、《荆楚岁时记》、《博物志》等等。颇富“史识”的《六朝通鉴博议》、《读通鉴论》与《史通》一类,能够启发我们读史、用史的思考;《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等则是常用的目录工具书。

上述文献资料都属常见书。读常见书其实是传统研究的基本功。葛兆光先生的一段话说明了“读常见书”的重要:“现在有的人对文献缺乏常识和通识,乱找乱引,喜欢找一些偏僻的、怪异的文献,而常见的书却视而不见……陈寅恪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没有什么偏僻的文献,但是一样有大见识。依靠那些偏僻文献,出奇兵,走偏锋,就像武侠小说里面讲的小巧一路,没有正派的内功为底子,终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就会一下子崩溃。”<sup>[8]</sup>读常见书而能读出大见识,没有挖掘机、显微镜、望远镜的三样功夫,没有全面系统的国学根底,没有专而且通的研究素质,也是不行的;就个人的体会而言,常见书还需要常读,道理很简单,做大学生时读书与做教授时读书,即使是同一本书,见识也不一样的。

相对于常见书性质的基本文献资料,新出的文物考古资料就属于新资料了<sup>[9]</sup>。这样的新资料能够强力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比如受限于传世文献资料的寡少,先秦秦汉史研究曾有进展艰难之叹;而20世纪80年代至今,其研究局面大为改观,这与新出简牍资料以几何级数增长、重要发现不胜枚举直接相关。这样的例子也见于六朝。如1996年10月,长沙走马楼街50号一座古井中,发现十几万枚三国吴简,超过了此前所发现简帛的总和。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宋少华先生指出:走马

楼简牍涉及东汉末至三国时期吴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领域,从目前已整理的部分看,不仅涉及的内容广泛,而且文书的格式、行文关系、用途都十分明确,这是今后进行系统研究的良好基础。走马楼吴简更多地记录了吴国县、乡、里政权的日常活动,反映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及其与官府的关系,这与正史主要记录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研究孙吴基层社会的第一手材料。其所记录的历史活动,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复杂、生动得多。这将大大扭转三国史资料极度匮乏的局面,拓宽三国史研究的视野,并对今后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为简牍学的发展注入更加旺盛的生机和活力<sup>[10]</sup>。

如所周知,传世文献中研究三国孙吴的关键资料是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吴书》20卷约103000字与南朝宋裴松之的注约65000字;而新出的走马楼吴简,作为当时的原始记录,不仅详细、牢靠,其惊人的数量本身就极大地扩展了孙吴史料的范围、研究的领域、探讨的层面。

由走马楼吴简一例,我们可以作出结论,研究六朝文化,养成关注、查找、利用、解说文物考古资料的习惯,是研究是否入流的又一个衡量标准。从根本上说,文物考古资料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历史是至为广泛的,一切与人类社会历史有关的学问,都无疑可从文物考古资料中汲取养分,寻求证据。以历史学(利用文献记载进行研究的狭义历史学)为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尤其是隋唐以前历史的研究,不结合新出土的文物考古资料,难有重大的突破;百余年来,商史研究之得益于甲骨文资料,战国秦汉史研究之得益于简牍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之得益于敦煌吐鲁番文书资料,都切实地说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从金石学、古器物学过渡到今日先进的考古学,也同样离不开历史学理论、方法与内容的进步。正是在互通与结合中,文物考古与历史研究达到了合则兼美的理想境界。反之,则是离则俱伤<sup>[11]</sup>。如在笔者的周围,或有治六朝史者不知用六朝墓志补订传世文献之缺误;又或有从事文物考古的学者,不明文献资料,脱离历史背景,臆说南朝石辟邪、神道柱之与中外文化交流的关系,臆解出土六朝文物反映的思想观念、文化象征,臆断一些遗址的年代与性质。

有些文物考古资料真的是非常精彩。比如南朝墓中的砖拼壁画“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羽人戏龙”、“羽人戏虎”、“骑马乐队”、“仪仗出行”、“飞天”,它们绝不是典籍的翻版或“文字化”,它们有典籍中不能描述的生动和充满意味的细节,将直

接有助于六朝思想史、绘画史、社会史、宗教史、服饰史、工艺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等的研究。至于有些传统的难题,受限于传世文献的缺乏,研究无法推进,如六朝都城的形制、规模与布局,学者们依据唐许嵩《建康实录》、宋元方志以及相关正史中的零碎记载,致力于复原工作,但意见分歧,难以取得共识;而2001年以来,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人员配合城市建设进行的一系列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六朝时期的城、壕、路、桥、井等重要都城遗迹,这样,笼罩在六朝建康宫城位置、都城布局等关键问题上的千年迷雾有望最终散去。还有些考古发现极大地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如由1965年南京象山王氏墓志的出土引发的王羲之书《兰亭序》的真(高二适为主将)伪(郭沫若为主将)之争,客观上拓宽加深了对中国书法史之研究资料、演变规律、复杂状况的认识。

了解与掌握六朝的文物考古资料,可由以下这些期刊与论著入手:《考古》、《文物》、《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东南文化》等期刊,《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年)、《江苏考古五十年》、《江苏省志·文物志》、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各种考古发掘专题报告,李蔚然《南京六朝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罗宗真《六朝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探索历史的真相——江苏地区考古、历史研究文集》、蒋赞初《长江中下游历史考古论文集》、罗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等等。

## 二 理论与学说

谭其骧先生曾经指出:“做历史研究若拿工业生产做譬喻,那末资料就是工业原料,理论就是生产工具。”<sup>[12]</sup>周一良先生也认为:“史料譬如一堆散乱在地上的大钱,必须用一根绳才能把它贯穿起来,这根绳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sup>[13]</sup>理论与学说的意义由此可见。随举两例。例一,《刍议》总结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之一是“复杂的民族关系”;而无论是研究十六国北朝的胡汉关系,还是探讨六朝的汉与越蛮俚僚的关系,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文中的精辟论断,即“相继征服过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当地居民同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的理论,都具有无可怀疑的指导意义。例二,陈寅恪先生认为:“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



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sup>[14]</sup>这段有关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特点的勾勒,影响颇为深远,时至今日,诸多研究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的中青年学者,其研究课题、路径与方法,都是在此指引下进行的,如王永平著《六朝江东世族之家学家风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六朝家族》(南京出版社2008年),即通过丰富、具体的事例,把陈先生的学说进一步落实了下来。

然则关涉六朝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学说”有哪些,这是一个很难说清的问题。按照我国现代学术史分期,衡以六朝史研究的实际状况,20世纪以前是以著史、考史、评史为基本路数的“旧史学”;而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演进规律的所谓“新史学”,萌动于19~20世纪之交;至于六朝文化的新史学研究,在20世纪的头30年并不明显<sup>[15]</sup>。如果一定要选出一个新史学范畴内的六朝文化研究之标志性年份,则1931年具有特别的意义。正是在这一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始讲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题课,包括六朝文化在内的这段历史的研究,也从此在史学界逐渐兴旺起来<sup>[16]</sup>;而所以如此的缘故,大概与陈先生的研究具备颇不同于“旧史学”的理论色彩、学说意味,从而给后来者留下了薪火相传、发扬光大的巨大空间有关。

如有关六朝文化,陈寅恪先生有诸多高论:“治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而不究家世信仰问题,则其所言恐不免皮相”,“盖研究当时士大夫之言行出处者,必以详知其家世之姻族连系及宗教信仰二事为先决条件”,因为“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sup>[17]</sup>。又“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唯一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础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的影响”<sup>[18]</sup>。又“南朝之政治史概括言之,乃北人中善战之武装寒族为君主领袖,而北人中不善战之文化高门为公卿辅佐。相互利用,以成此江左数百年北人统治之世局也”,至于南人,则“东晋初年孙吴旧统治阶级略可分为二类,一为文化士族,如吴郡顾氏等是,一为武力

强宗,如义兴周氏等是,前者易于笼络,后者则难驯服”<sup>[19]</sup>;又“南朝疆域内北语吴语乃士庶阶级之表征,非南北籍贯之分别”,“东晋南朝官吏接士人则用北语,庶人则用吴语,是士人皆北语阶级,而庶人皆吴语阶级”<sup>[20]</sup>。诸如此类新颖的理论、学说、方法、观念,发人深思,给人启迪,于是,家族、地域、信仰、家学、门风、文化士族、武力强宗等等,成了六朝文化研究中常见的“关键词”,无论是赞成、继承、发挥、发展,还是质疑、异议、反对,后来者都无法绕过陈寅恪的研究。

“应该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日益繁荣、日益深化,是和陈寅恪先生的开拓性研究分不开的”<sup>[21]</sup>。而类似陈寅恪这样的一流大师,在包括六朝文化研究在内的魏晋南北朝史领域,还有不少,不仅中国有,国外也有。可以认为,这是研究六朝史的又一明显优势,即一流大师多而余意丰富。一流大师者,开风气、建理论、立学说,却并不穷尽研究,于是,这就给后来者点了题、立了意,设了很高的起点,开了无限的法门,或者提供了重要而明显的商榷甚至反对的目标。理论与学说的价值在此。

依据上面的讨论,新史学范畴内的六朝文化研究之理论与学说,再就日本、韩国各举一例。

日本谷川道雄的“共同体”理论。按照谷川道雄著《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1976年初版,1989年再版)中文版译者马彪的说明,谷川氏是日本史学界京都学派的传人,也是该学派继内藤湖南、宫崎市定之后的第三代领头人。谷川氏在探索中国中世(或称“中古”,指魏晋隋唐时代)的研究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共同体”理论。所谓“共同体”,即以人群划分的社会组织,包括“豪族共同体”、“村落共同体”、“地域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国家共同体”等等。从共同体的人际关系原理上说,“豪族共同体”是社会的基层共同体,豪族在共同体中“能获得领导的资格全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德望”,也就是说,作为共同体的凝聚力,虽然不排除财力、武力、家族力,但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有道德力、伦理力<sup>[22]</sup>;而民众是共同体伦理关系的存在基础,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理解,为什么民众最能识别并敬仰高尚的人格,“以便以其作为自己道德生活的楷模”,为什么存在着“超越自身爱以谋求人类共存的人格”,为什么“被领导者有着自下而上判断领导资格的作用”等等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sup>[23]</sup>。有趣的是,曾经为日本和欧美史学界熟知并广为接受的这种“共同体”理论,起码在近十多年来的日本国内已经越来越相对化,“正史”等史料的批判研究则越来越丰富与深入,即表现出由理论回归

史料、致力于精密化研究的趋向;而与此同时,在中国大陆,随着留日背景学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出自中国学者的六朝研究论著中,超越阶级对立的“共同体”理论或学说的色彩却愈显明显。

韩国朴汉济的“侨旧体制”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汉城大学校(今首尔大学校)朴汉济教授在《中国中世胡汉体制研究》(1988年)等系列论文中,构建了“胡汉体制”理论,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大多由胡族建立政权,统治胡汉诸族,胡族虽然继承了原汉族统治的方式和制度,但仍然保留了许多胡族的制度和习俗,胡汉两种文化在矛盾、碰撞的过程之中,最后相互融合,形成为带有胡汉两种民族特征的新体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朴先生又进一步提出了东晋南朝史的“侨旧体制”理论,即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汉族大幅度南迁,于是在东晋南朝统治地区,“侨民”与“旧人”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由冲突到融合,最终形成为新的“侨旧体制”。进之,十六国北朝史的前提是“胡汉体制论”,东晋南朝史的前提是“侨旧体制论”,两者统合起来就是“侨民体制”,直言之,魏晋南北朝历史是在脱离故乡的人即侨民的主导下发展与变迁的<sup>[24]</sup>。对于这样的“侨旧体制论”以及相关的“胡汉体制论”、总结性的“侨民体制论”,我们感觉非常的重要。如《刍议》围绕“复杂的民族关系”、“频繁的人口迁移”的讨论,其意与朴氏相近;又以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历史,虽然错综复杂,但其中也有主要线索可寻。此主要线索,在十六国北朝为胡汉问题,在东晋南朝为侨旧问题。所谓“胡”,乃三国西晋时代不断内徙及十六国北朝时代先后入主中原的非汉民族,所谓“汉”,即十六国北朝时代北方之汉族士民;又所谓“侨”,主要指西晋永嘉乱后不断南徙的北方官民,所谓“旧”,主要指南方土著。胡汉之间、侨旧之间既颇多矛盾,又有各种形式的合作。胡汉之间因有矛盾,引起了大量北方人口的侨流南方,侨旧之间因有矛盾,促成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大量设置;胡汉之间、侨旧之间又有合作,从而十六国北朝得以立国于北方,东晋南朝得以立国于南方。以此,治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史,理解侨州郡县以及与之相关的侨流人口,是为关键<sup>[25]</sup>。

进而论之,就具体的六朝文化之认识与理解言,“侨旧体制”也可谓一把钥匙,一种有效的体系或方法。

由以上所举中、日、韩三例,已不难感受到理论与学说对于活跃学术研究的意义;换个角度说,

哪怕习惯于实证性研究的学者对这些理论与学说不予采信,也无法不予理睬,因为积累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史的研究,不是从头说起,而是接着前人的话往下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研究状况<sup>[26]</sup>,把握学术路径,梳理理论与学说从提出到丰富、从完善到式微的变迁脉络。否则,面对越来越显“海量”的论著,我们的研究将陷入失去方向、缺乏线索的混沌迷茫之境地。

归纳近百年来新史学范畴内与六朝文化的理解和研究直接或间接有关的比较宏观的理论和学说,值得提出者当然还有许多。如陈寅恪的关陇集团说、隋唐制度渊源说、社会阶级意识高于地域意识说、胡汉之分在文化不在种族说,何兹全、尚钺、王仲荦、唐长孺等的“魏晋封建说”,陈寅恪、唐长孺等的唐制南朝化说,田余庆的东晋一朝门阀政治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冈崎文夫、川胜义雄、宫崎市定等为主的“贵族制社会”或“贵族制时代”说,西岛定生的册封体制论,崛敏一的身份制说,谷川道雄等人倡导的“地域社会”说,等等。对于这些理论与学说的创立、成熟、体系、影响及其反对观点,从事六朝文化研究者都应了解,如此将大有利于对诸多学术问题演变历程的追踪及对现代学术史的把握;“当某种理论一旦被权威厘定并为大多数人所遵循,成为先验的规范、不言自明的信念的时候,就会使人们的思想很难摆脱预设的障碍,突围而出”<sup>[27]</sup>,所以,以广泛而坚实的实证性研究为基础,而又勇于提出新的理论与学说,也就成了研究者高悬的奋斗目标了。

### 三 “致知”与“致用”

我们做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追求名山事业,这是很高的境界;作为个人兴趣,这也非常正常,并且值得提倡。但是,只有这些还是不够的。从实际情况出发,往大处说,研究六朝文化,有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准确地理解六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助于全面把握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博大精深。往小处说,为了实现自身的发展与学术的价值,也必须去关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去服务于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即要走经世致用之路。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

例一,在2003年第八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由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获得一等奖。为什么《六朝文化》能获得官方这样的肯定?本文以为主要原因有下几方面:一是江苏特色,六朝之于江苏之于南京太有意义了;二是众手成书而能做到吸纳众人之长,并且自成一体;三是最新

的文物考古资料的合理应用；四是把经世致用落到了实处，注重可操作性。这第四点应该是政府与民间最看重的。《六朝文化》一书由旨在“致知”的“基础研究编”和旨在“致用”的“应用开发编”两部分组成，其中“应用开发编”包含了七个富有创意的专题：“江苏省域六朝文化遗存及其开发利用”、“六朝石刻的保护和利用”、“六朝京口云阳文化带与现代文化振兴”、“六朝旅游与江苏六朝专题旅游发展战略”、“六朝家族研究与姓氏资源开发”、“六朝文物陈列与六朝文化开发”、“南京市博物馆‘六朝风采’陈列专馆及其启示”。其实“应用开发”的空间远不止此，诸如六朝衣食住行的综合研究及其开发利用、六朝文化对现代城市雕塑创意的启示、六朝文物的仿制与旅游纪念品市场、六朝历史文化与爱国爱乡教育；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甚至在考虑接手一些家谱的编修与续修。

例二，2003年11月27日~12月1日，浙江省长兴县举办了“陈武帝诞辰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文化经贸系列活动”。研讨会的主题为“陈武帝的历史作用及南朝史”。其他的活动主要有三类：一是陈皇后裔系统的，有联谊会成立仪式、主题报告会、工商代表投资恳谈会、代表联谊座谈、祭祖活动；二是陈皇故里摄影大奖赛；三是地方政府主办的，如“太湖韵·帝乡情”中国民乐演奏音乐会、“帝乡风情”广场文艺演出、陈霸先铜像揭幕仪式、陈霸先研究中心成立，以及众多的考察参观活动。活动丰富多彩，而且后来学术上的陈霸先研究与经济上的陈皇后裔投资，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则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学者在努力“致用”的同时，切切不可放松“致知”的追求，而且真正意义上的“致用”，是以坚实、规范的“致知”为基础的。以《刍议》文中提及的齐梁帝王故里之争为例，参与争论或置身其中的不少学者，或对相关的历史文献、考古文物、实地调查资料缺乏钻研，或对各种各类资料的“权重”不能准确把握甚至有意混淆，又或对相关的学科如历史政区地理、魏晋南北朝史本就非常陌生<sup>[28]</sup>，也就是尚未“致知”，即求功利性质的“致用”，这样的“致用”，于个人是不负学术责任的行为，于社会是徒添视听混乱的举动。笔者认为，按照齐梁当时的说法，齐梁帝里与齐梁帝陵，都在南兰陵郡兰陵县。只是东晋南朝时代由侨改实、且有置废的南兰陵郡与兰陵县，其治所尤其是境域，与清朝以及现今的武进、丹阳之间的对应关系，实属纠葛难明。如此，则齐梁帝里是否就在今日的武进境内，仍为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也就是说，“依靠现有的历史文献、文物考古、民间传说

等等资料，并不能得到明晰的结论”<sup>[29]</sup>。本文以为，与其热衷于目前限于资料而实难取得进展的争论，不如多在表彰齐梁皇朝之于正朔相承、开发江南、发展文化、声教广暨等方面的贡献上做功夫，不如多多关注怎样做实、做强现实中已经拥有的或者具有开发前景的齐梁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的应用开发，谁做得好、做得早、做出特色，谁就得益，就占有先机。

总之，“致知”与“致用”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关系，“致知”是基础，“致用”是值得倡导的目的之一。作为历史文化资源积淀深厚、经济社会实力强劲的江苏与南京，在六朝文化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方面，当然是大有可为的。因为六朝之于江苏、南京，正如汉唐之于陕西、西安，北宋之于河南、开封，南宋之于浙江、杭州，以及明清之于北京，所以江苏与南京不能不了解六朝、研究六朝，进而理解六朝、利用六朝。我们相信，江苏以及南京的六朝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与利用，一定会成为学界重视、政府支持、社会关心的热点，并且取得显著的成效。

[1]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陈高华、陈智超等著：《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第四章“魏晋南北朝史料”，北京出版社1983年。

[3]苏晋仁：《论沈约〈宋书〉八志》，收入《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

[4]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代序》，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5]〔日〕安田二郎：《晋宋革命和雍州（襄阳）的侨民——从军政统治到民政统治》，收入《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六朝隋唐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6]胡阿祥：《历史文献是史学研究的原料（上）》，《南京晓庄学院》2006年第3期。

[7]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岳麓书社1984年。

[8]葛兆光：《大胆想象终究还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文汇报》2003年3月9日。

[9]当然，新资料的范围也包括新发现的传世文献资料。如在中国久已失传的三种观世音应验故事集，即南朝宋·傅亮《光世音应验记》、南朝宋·张演《续光世音应验记》、南朝齐·陆果《系观世音应验记》，其抄本留存在日本京都青莲院里。1990年，在中日双方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观世音应验记》三种得以在中国出版。这是十分珍贵的六朝小说与佛教文献，对研究社会史、汉语史、民俗史等，具有重要价值。

[10]宋少华：《长沙三国吴简保护整理与研究的新进展》，《长



- 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 2005 年。
- [11]胡阿祥：《合则兼美离则俱伤》，《东南文化》2002 年第 6 期。
- [12]谭其骧：《对今后历史研究工作的四点意见》，收入氏著《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 [13]周一良：《怎样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学史入门》，中华书局 1988 年。
- [14]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
- [15]其运用新史观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力作，有汤用彤《竺道生与涅槃学》（1925 年）、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927 年）等。
- [16]周一良：《纪念陈寅恪先生》，《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 [17]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中华书局 1963 年）。
- [18]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 [19]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
- [20]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东晋南朝之吴语》（收入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
- [21]简修炜、高永清：《论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 [22][日]中村圭尔：《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对“豪族共同体”的解释是：“简单地说，豪族共同体是指作为大土地所有者的豪族与小农之间超越了对立而重新结合起来的产物，其中的首长不是作为阶级的统治者，只是作为基于共同体原理的共同体领导人而存在，并成长为贵族。由此，‘共同体论’与贵族制相结合，被看成体现魏晋南北朝作为中世性质的现象。”收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 [23][日]谷川道雄著、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译者说明”，中华书局 2002 年。
- [24]周伟洲：《“胡汉体制”与“侨旧体制”论——评朴汉济教授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新体系》，《中国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
- [25]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的文献记载与研究回顾》，收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
- [26]20 世纪以来有关六朝史研究状况的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可以参阅曹文柱、李传军所撰《20 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收入曹文柱《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商务印书馆 2008 年），台湾、香港地区的情况可以参阅高明士主编《中国史研究指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0 年），日本的情况可以参阅山根幸夫等编《中国史研究入门（增订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谷川道雄等编《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 1997 年），韩国的情况可以参阅金裕哲《韩国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收入前揭《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又《中国史研究动态》每年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网站（<http://www.6ch.com.cn>），日本方面每 5 年出版一次的《日本历史学的发展与现状》中的魏晋南北朝部分，韩国方面的魏晋隋唐史学会所编《魏晋隋唐史研究》辑刊、中国古中世史学会所编《中国古中世史研究》辑刊，也是值得跟踪与关注的对象。
- [27]曹文柱、李传军：《20 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曹文柱《魏晋南北朝史论合集》。
- [28]“在认定地域文化资源上，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权重，地方志、民间传说等资料不如正史分量重；现在有的人考订地名以名家著作，甚至以名家主编的书的某些说法为根据，这是不妥当的。因为有的名家专业领域并不是历史地理。一些辞书更不能作为依据，因为有些辞书本来就不准确。”引自叶扬兵：《地域文化资源的科学认定与合理利用——江苏地域文化研究第二次学术沙龙综述》，《江苏社联通讯》2009 年第 4 期。
- [29]胡阿祥：《以怎样的态度研究齐梁文化、探讨齐梁故里》，2009 年“中国常州·齐梁文化研讨会”提交论文。

## Further Comment on the Research of Six Dynasties Culture

LI Liang-fang<sup>1</sup> HU A-xiang<sup>2</sup>

(1.Department of Humanity, Nanjing Xiaozhuang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211171;

2.History Department of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To broaden and deepen the basic & applied research of the Six Dynasties Culture, some aspects should be well worth attention: being familiar with the basic documents, making use of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possessing the relevant theory and doctrine and properly 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i Zhi( pursuit of knowledge)” and “Zhi Yong(pragmatism)”, etc.

Key words: basic documents;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theory; doctrine; pragmatism